

安徽屯溪土墩墓与休屯盆地区域文明研究

王昌月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安徽屯溪八墓随葬原始瓷豆的型式分析显示屯溪土墩墓群年代始于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并延续至两周之际。八墓出土青铜礼器区域特征突出、艺术风格影响深远，应为本地铸造。处于原始瓷和铜矿资源流通的重要节点，西周时期休屯盆地成为重要的区域文明中心，曾、应两国也在中原与东南地区的交流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键词】：屯溪 土墩墓 西周 原始瓷 铜矿资源 流通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A

1959—1975 年，安徽屯溪弈棋村陆续发现并清理土墩墓八座，出土大量青铜器、印纹硬陶及原始瓷，学界习称“屯溪八墓”。钻探表明，该地原为一处土墩墓群，墩与墩之间相距少则数十米、多则数千米。遗憾的是，除上述八墓外，其余均被夷为平地或叠压于现代建筑之下。屯溪八墓的发现填补了过去休屯盆地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认识的空白。虽然土墩墓作为一种特殊的丧葬形式广泛存在于皖南地区，经正式发掘的墓葬数量也颇为可观，但迄今为止仍以屯溪八墓等级最高，其文化面貌亦较沿江地区有别，是为独立文化单元。继屯溪八墓后，该区域再未有正式的商周时期考古发掘资料发表，屯溪八墓仍是学界探寻休屯盆地先秦文化面貌的重要钥匙。随着皖、苏、浙、赣、闽等周边区域考古学文化谱系日益明朗，为重新解读屯溪八墓所蕴涵的历史信息提供了有利契机。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首先重新讨论屯溪八墓的年代问题，继而以此为基础分析其随葬铜器的来源背景，并试图思考以屯溪八墓为代表的休屯盆地区域文明在东南地区乃至整个西周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一、屯溪八墓年代的再认识

墓葬的年代是讨论屯溪八墓及相关问题的基础，也是历来争议的焦点。早期，研究者们多偏重于对随葬青铜器年代的研究，从形制、纹饰、器物组合、兵器等多角度进行考察，主要观点有春秋后期说^[1]、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说^[2]、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说^[3]等。通过青铜器分析得出的墓葬年代分歧较大，其根源在于青铜制品经久耐用，铜器的年代不一定等同于墓葬的年代，且吴越地区出土的绝大部分青铜器形制风格与中原地区差异明显，难以从类比角度推此及彼。此外，吴越本地铜器不论是出土背景还是数量，其资料都尚不足以建立独立的区域编年体系。从青铜器的角度研究墓葬年代，还需着眼于对非中原地区青铜器年代学研究理论的探索^[4]。欣慰的是，已有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5]。

另有一些学者试图通过东南地区土墩墓的分期来探讨屯溪八墓随葬铜器的年代，如施劲松持西周中期说^[6]；郎剑锋认为 M1、M3、M4、M5 年代为西周中期，M6 年代为西周晚期，M2 年代为春秋早期^[7]；杨楠认为 M5、M6、M7 年代为西周中期，M1、M2、M3、M8 年代为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8]；付琳认为 M3 年代为西周中期，其余墓葬年代为西周晚期，下限或至春秋初年^[9]。

收稿日期：2017-1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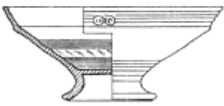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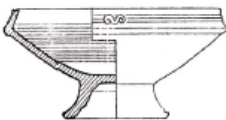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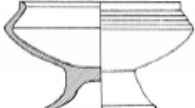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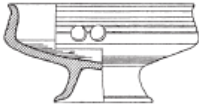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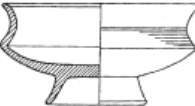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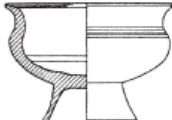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王昌月（1993—），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商周考古。

本文认为,对屯溪八墓年代的讨论,尤其要重视陶、瓷器资料。相较于青铜器的断代而言,陶、瓷器使用时间更短,其年代相对也更接近于墓葬的埋藏年代。近年来大量土墩墓及与之相关的居址、原始瓷窑址等的发掘,改变了以往只见墓葬而不见居址,只见产品而不见生产的局面,对东南地区陶、瓷器的分期与编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屯溪八墓陶、瓷器与青铜器共存,着眼于陶、瓷器的分期与年代,不仅有助于墓葬埋藏时间的讨论,亦可启发地方型青铜器的年代学研究。

通过对东南区域居址、窑址、墓葬等材料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在所有原始瓷产品中,豆是出土数量最多的器类之一,形态亦较多样,有明晰的地层依据,具有分期意义。推及屯溪八墓,原始瓷豆也是随葬品中的大宗,不仅数量众多,型式变化亦颇为丰富,为我们重新认识八墓的年代提供了线索。

通过对屯溪八墓随葬原始瓷豆的观察,可根据口腹特征将其分为两型(表一)。

表一// 屯溪八墓随葬原始瓷豆型式划分

型式 年代	A 型	B 型	
		Ba	Bb
西周早中期	 M3:049 I 式	 M3:62 I 式	
西周早期偏晚至 中晚期	 M1:23 II 式	 M1:8 II 式	 M1:5 I 式
西周晚期至 两周之际	 M4:31 III 式	 M5:25 III 式	 M7:10 II 式
两周之际		 M8:4 IV 式	

A 型斜弧腹。根据口沿、腹部及圈足特征可分为三式。

I 式,折腹,无沿,圈足较矮。标本 M3:049。

II 式,弧腹,卷折沿,圈足较矮。标本 M1:23。

III 式,弧腹,卷折沿,圈足较高。标本 M4:31、M5:35。

B 型上腹部内收。根据腹部特征可分为两亚型。

Ba 型折腹。根据口沿、腹部及圈足特征可分为四式。

I 式, 无沿。标本 M3 : 62。

II 式, 折沿。标本 M1 : 8、M4 : 5、M6 : 2。

III 式, 折沿, 沿面较上式宽, 腹部较上式浅。标本 M5 : 25、M7 : 8、M2 : 72。

IV 式, 折沿, 圈足较上式矮。标本 M8 : 4。

Bb 型弧腹。根据腹部特征可分为两式。

I 式, 腹较浅, 整体矮胖。标本 M1 : 5。

II 式, 腹较深, 圆鼓腹。标本 M7 : 10。

其中, A 型 II 式豆与杭州萧山柴岭山 D17M2 : 1 原始瓷豆形态接近, 流行于西周晚期。Ba 型 I 式豆敛口, 口部施多道弦纹, 与河南洛阳北窑西周早期 M215 : 36、西周中期 M307 : 1 原始瓷豆形态接近, 有的豆盘内还有一小孟 (M3 : 77), 这在湖北叶家山西周早期墓中亦有发现 (M28 : 02)^[10]; Ba 型 II 式豆敛口, 折沿, 与叶家山西周早期偏晚 M27 : 111、洛阳北窑西周中期 M139 : 28 原始瓷豆形态相近; Ba 型 III 式豆宽沿、折腹, 与安徽师姑墩西周晚期 T7⑤ : 1 原始瓷豆形态相近; Ba 型 IV 式豆与萧山柴岭山 D35M1 : 21 原始瓷豆形态接近, 流行于两周之际; Bb 型 I 式豆与萧山柴岭山 D20M2 : 5 原始瓷豆形态接近, 年代约为西周中期^[11]。综上所述, A 型 I 式、Ba 型 I 式豆年代大约为西周早中期, A 型 II 式、Ba 型 II 式、Bb 型 I 式豆约从西周早期偏晚延续至西周中晚期, A 型 III 式、Ba 型 III 式、Bb 型 II 式豆约流行于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 Ba 型 IV 式豆流行于两周之际。据此推断, 屯溪 M3 年代约为西周早期偏晚至西周中期, M1 年代约为西周中晚期, M4、M6、M5、M7、M2 及 M8 年代约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考虑到这八座墓葬仅为屯溪土墩墓群随机发现的一小部分, 有理由认为, 屯溪土墩墓群的年代至晚始于西周早期偏晚且至少延续至西周晚期到两周之际。八墓中随葬有大量青铜容器、兵器、乐器、车马器等, 暗示这是一处高等级墓葬群。依现有发掘资料, 皖南地区经过正式发掘的西周至春秋早期阶段土墩墓主要有南陵县千峰山^[12]、龙头山^[13]、繁昌平铺^[14]、宁国安友^[15]、宣州棋盘崔村^[16]等, 除偶见随葬铜环等小件的墓葬外, 均未发现随葬有大量铜兵、礼器的高等级墓葬。上述土墩墓群年代亦从西周早期延续至两周之际, 且均位于长江沿岸, 临近长江中下游铜矿带, 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交通优势, 却鲜见高等级墓葬, 究竟是尚未发现还是另有他因值得深思。如若继续放眼整个东南地区的土墩墓群, 随葬青铜礼、兵器的西周墓葬主要分布于宁镇地区, 如江苏丹徒烟墩山^[17]、磨盘墩^[18]、母子墩^[19]、溧水乌山^[20]、宽广墩^[21]、仪征破山口^[22]、浦口长子墓^[23]、高淳下大路^[24]; 赣西北地区, 如上饶马鞍山^[25]; 闽北地区, 如浦城管九^[26]; 环太湖地区似乎缺乏随葬铜器的传统^[27]。休屯盆地恰好处于上述几个区域的交界地带。虽然我们尚未开展相关居址工作, 但依然可以推测屯溪地区很可能是作为区域文明中心存在的, 这一中心从西周早期偏晚延续至春秋早期, 持久而具有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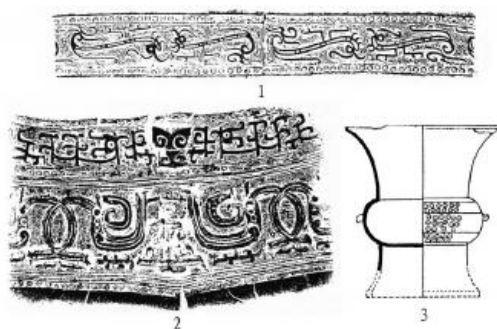
二、屯溪八墓的铜器来源背景

前文基于原始瓷对屯溪八墓的年代作出了判断, 那么其随葬铜器的年代下限亦随之得到确认。在此前提下, 笔者将通过对八墓随葬铜器特征的分析, 讨论该区域的铜器来源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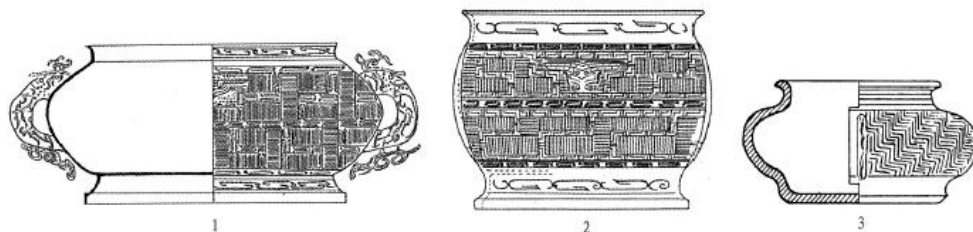
关于屯溪八墓出土的铜器,以往研究者习惯将其分为“中原型”“地方型”和“融合型”三类^[28]。其中,“中原型”器物的形制、纹饰基本与中原地区出土青铜器无异,有些铸有铭文,如 M3:07 卣铭:“公乍宝尊彝,其孙子永用”;M3:08 卣铭:“乍宝尊彝”;M1:90 尊铭:“父乙”。铭文字体、格式甚至日铭用法都与中原地区一致。其中与 M1:90 尊铭“”同样的铭文在山西长子西旺村亦有发现^[29]。本文亦认为,这类铜器是在中原地区铸造,并通过某种途径流布至休屯盆地。

本文主要讨论“地方型”和“融合型”铜器的来源问题。这类铜器具有以下三点特征。

第一,从纹饰上看,大量本地陶器,尤其是印纹硬陶的装饰纹样被使用到铜器的装饰中。例如常在中原青铜器装饰中作为界栏的圆圈纹在东南地区被圈点纹所取代。圈点纹可追溯至商时期,江西吴城文化的陶、瓷器中大量使用这一纹饰;不过,吴城文化的铜器装饰仍采用的是中原式圆圈纹作界栏。随着吴城文化的衰落,圈点纹的影响却扩大至包括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在内的更大范围,并被运用到铜器的装饰中。屯溪八墓随葬青铜器的界栏大多为圈点纹(图一:1、2),M6:1 青铜尊甚至以圈点纹作为器物腹部的主体纹饰(图一:3)。又如,通常被施于器身作为主体纹饰的不规则几何形席纹,与硬陶的几何形印纹相类,M3:06 青铜簋、M3:20 青铜方鉴便与 M3:91 印纹硬陶簋上所施曲折纹有异曲同工之妙(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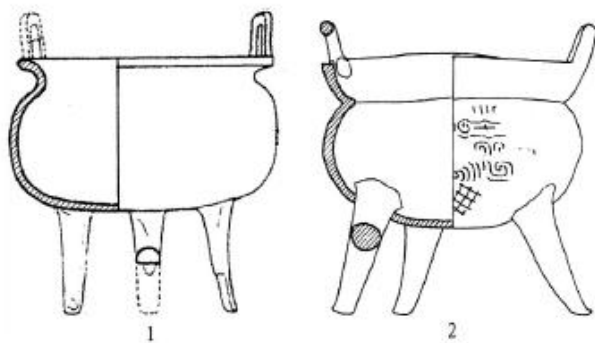


图一// 屯溪八墓出土青铜器上的圈点纹装饰
1. 青铜盘腹部纹饰(M3:19) 2. 青铜卣腹部纹饰(M1:93)
3. 青铜尊(M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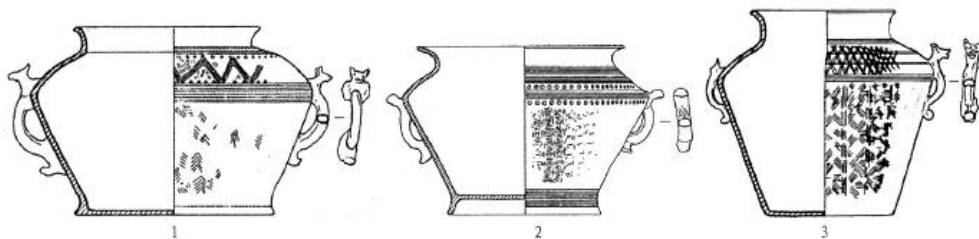


图二// 屯溪八墓出土青铜器上的席纹装饰
1. 青铜簋(M3:06) 2. 青铜方鉴(M3:20) 3. 印纹硬陶簋(M3:91)

第二,青铜器器形与本地陶、瓷器器形互相模仿。有青铜器模仿陶、瓷器者,如 M3:012 青铜鼎立耳、束颈、宽沿,三细锥足略外侈,与 M3:039 印纹硬陶鼎形态相类,通常被称为“越式鼎”(图三)。这类鼎的束颈风格源自晚商时期的湘江流域,西周早期发展出三细锥足外撇的形态,广泛存在于长江以南地区。亦有陶、瓷器模仿青铜器者,即仿铜陶礼器,如屯溪墓中的陶簋,造型风格与青铜簋相类,有的还装饰有扉棱。又如原始瓷兽耳尊,器物主体为尊形,器耳作兽状,M4、M5、M8 三墓中均有出土,通常两件一组随葬(图四)。其兽耳模仿自西周早期青铜器耳简单朴素的造型。至两周之际,皖南一带继续发展出以兽耳为典型特征的青铜龙耳尊,南陵县团结村出土 1 件^[30]、青阳县汪村出土 2 件^[31],上海博物馆亦收藏有 2 件传出土自皖南地区的龙耳尊^[32]。青铜龙耳尊的耳部造型较原始瓷兽耳尊对兽形的刻画更为具象,兽耳体积硕大,整体造型夸张,装饰意味更加浓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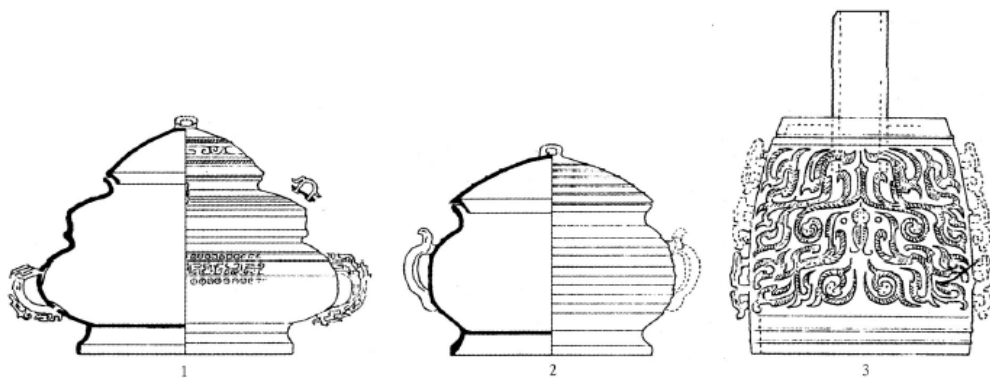


图三// 屯溪八墓出土越式鼎
1.青铜鼎(M3:012) 2.印纹硬陶鼎(M3:039)



图四// 屯溪八墓出土原始瓷兽耳尊
1.M4:48 2.M5:48 3.M8:11

第三, 屯溪八墓中出现了大量创新型青铜器造型, 有的甚至影响到其后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如 M3:5 方鼎, 器身长方体、口沿内曲、四角尖翘、浅腹、四短兽蹄足; 又如 M3:011 方鉴, 器身长方体、鼓腹、方圈足。屯溪墓中出土有大量此类器形, 多是在母体器类基础上加工创造而成。其中有一些甚至影响到后期其他地域的铜器造型。如双层簋 M3:10(图五:1), 这类器物是在单层簋(图五:2)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后在河南固始侯古堆 M1^[33] 及浙江绍兴 M306 中均发现有这一器类^[34]; 铜方座器 M3:12(图五:3), 流行于春秋中晚期以后的楚墓中^[35]; 三段式鼓腹尊, 多见于环太湖地区的江苏淹城^[36]、浙江绍兴^[37]等地; 扁体簋 M2:87, 以浅扁腹为主要特征, 后在安徽繁昌汤家山墓中亦有发现^[38]。上述器形均首见于屯溪八墓中, 尔后传播至东南其他区域甚至淮河流域, 表明屯溪地区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影响深远而广泛。



图五// 屯溪八墓出土的创新型铜器
1.双层青铜簋(M3:10) 2.青铜簋(M3:23) 3.青铜方座器(M3:12)

从上述三点来看,所谓“地方型”及“融合型”青铜器的造型、装饰艺术多来源于本区域的土著文化传统,其中部分艺术发明影响深远,这类铜器并不是产品的“外贸”流散,应是本地铸造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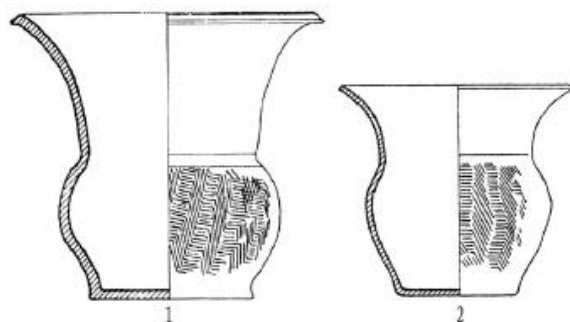
从屯溪八墓随葬青铜器的组合来看,作为随葬品的青铜器器类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西周早中期至西周中晚期阶段,食器以鼎、簋为核心,水器组合为尊、卣、盘,另在 M3 中还发现了车器以及修车工具。与宁镇地区相比,缺乏鬲、甗等食器,显然分属于两类丧葬制度。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阶段,青铜食器消失,多随葬青铜兵器剑。青铜尊始终是随葬品组合的核心,南方地区对这一器类的偏爱,自商时期便可见端倪^[39]。据三晋地区经验,车马器、兵器、大口尊等随葬器物具有性别指示意义^[40],然而在屯溪 M7、M8 两座墓中均见有作为男性墓标志的兵器与作为女性墓标志的大口尊共存,表明屯溪地区似乎并未遵循中原地区的埋葬习俗。综上所述,屯溪地区的随葬组合有鲜明的区域特点,不仅有别于中原地区,与宁镇地区也不尽相同。西周早期阶段,有对中原丧葬习俗的刻意模仿,青铜食器在墓葬中多见;自西周后期始,丧葬观念更加本土化,青铜尊成为重要的随葬品。

无论是从铜器的个体特征来看,还是从铜器的组合特征观察,屯溪八墓中除了少部分铜器可能直接来自于中原地区外,大部分铜器应为本地生产;休屯盆地自西周早期偏晚始,已然形成了区域铸造中心,礼制亦自成体系。事实上,晋南地区绛县衡水墓地、翼城大河口墓地,湖北叶家山曾国墓地、羊子山噩国墓地的考古证据均表明,西周时期诸侯国独立生产青铜器已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41]。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具有一定的铜器生产力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现象,那么以下问题值得思考:为何偏居东南一隅的休屯盆地也具有独立生产能力?该地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以及墓中随葬的直接来源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何种方式传入此地?这一区域又为何形成一个自西周至两周之际的区域文明中心?

三、区域文明中心的形成

通过前文分析,笔者认为屯溪地区在西周早期偏晚至两周之际是一个具有独立铸造青铜器能力、礼制自成体系的区域文明中心。从自然地理角度来看,屯溪地区四周环山,主要依靠水系对外交通,地形地貌不利于发展农业。而休屯盆地以北便是长江沿江平原,不但有优渥的自然地理条件,而且是长江中下游铜矿带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沿江平原地带显然有更加优越的发展条件,却至今未发现西周时期的中心聚落,亦不曾发现高等级墓葬,一南一北之反差,让笔者进一步思考屯溪地区区域文明形成的动因。

屯溪八墓中出土的部分陶器给笔者提供了线索。屯溪 M7、M8 各随葬一件印纹硬陶大口尊,平底、鼓腹、敞口,口径大于腹径,尊腹施几何形曲折纹(图六)。西周时期的陶大口尊数量少,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主要出土于晋西南和关中地区,如天马曲村墓地、晋侯墓地、横水棚氏墓地、周原遗址、沔西遗址、周公庙遗址、永凝堡墓地等^[42]。从器物形态来看,屯溪大口尊与晋西南、关中地区大口尊特征基本一致,但器物材质和装饰却选择了具有本地色彩的几何形印纹硬陶,那么休屯盆地是如何实现这一模仿与创新的呢?仔细梳理大口尊向南方传播的路径,不难发现,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和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是两个重要的据点,如应国 M231、曾国 M46 等墓中均发现随葬有大口尊^[43]。这一器物沿着晋西南、关中等地至应国经随枣走廊到达曾地,然后沿长江又可抵屯溪地区。屯溪墓出土的越式鼎也印证了这一路线。屯溪 M3:039 印纹硬陶鼎,敞口,宽折沿,圆鼓腹,细圆锥状三足外撇,腹部施拍印云雷纹。叶家山 M50 发现有越式鼎一件,泥质灰陶,敞口,束颈,圆腹,细圆锥状三足外撇,腹部施网格状菱形纹^[44]。有关越式鼎,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的湖南、皖南、江西、浙江以及两广地区,屯溪 M3 出土印纹硬陶越式鼎作为最早阶段的越式鼎之一,对探索该类器物的源流具有重要意义。叶家山 M50 出土有越式鼎,无疑表明了两地之间的早期交流。



图六// 屯溪八墓出土的印纹硬陶大口尊
1.M7:12 2.M8:15

此外,亦有学者致力于南方地区青铜器对中原地区反向影响的讨论,研究表明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中,即可看到来自屯溪铜器群的影响。如平顶山 M85 出土的铜盃(M85:15),器盖蟠龙饰 D 形鳞纹,铜盃主体纹饰边缘均用一类特殊的交联纹为界栏,肩部衬托主体纹饰的云雷地纹为长条形,这些特征与屯溪 M3:6 盃一致,而不同于中原地区^[45]。又如屯溪 M3:11 鼎耳所饰∞形勾云状夔纹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种特殊的地方化纹样,在平顶山应国墓地 M48:2 铜鼎腹部也饰有同样的纹饰,且两鼎具有同样的分范方式^[46]。此外,应国青铜器在江西余干黄金埠也有发现,为一甗,甗内有铭文“应监乍宝尊彝”,年代为西周早期^[47],说明应国与其东南地区联系紧密。

综上所述,屯溪八墓出土随葬品中的部分文化因素表明,休屯盆地的社会上层与曾、应等国往来密切。这一文化交流背后的动因又是什么呢?有关原始瓷的最新发现为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

原始瓷的产地问题困扰学界良久,目前尚无定论,有学者通过类型学的研究认为从器形、纹饰上看,中原地区出土原始瓷来自南方地区^[48]。近年来,东苕溪流域和闽北一带发现了大量原始瓷窑址,年代可早至夏商时期,为原始瓷的南方生产提供了重要证据。应国、曾国的高等级墓葬中多随葬有原始瓷,其原始瓷产品不论是形制还是装饰,均能在东南地区找到对应。因此本文倾向于认为中原地区原始瓷来自于南方,曾、应两国作为中转点,原始瓷产品从东南经随枣走廊、平顶山向中原地区流动。屯溪地区与太湖南部同属于钱塘江水系,东西流向的新安江作为钱塘江流域的上游段,经浙江淳安、建德与来自金衢盆地的兰江汇合为钱塘江的上游富春江,成为该区域与浙江地区交通的重要孔道;闽江水系源自安徽祁门境内,向南流经江西浮梁县、景德镇与源自安徽婺源而流经江西德兴、乐平的乐安河于鄱阳县相汇为饶河,构成徽饶水道;徽水河、舒溪河向北汇入长江支流青弋江,构成徽宣水道。发达的水系使得休屯盆地既能连通长江沿岸铜岭、铜陵等地的铜矿资源,又可以通达环太湖地区的原始瓷窑址,成为原始瓷流向中原和铜矿资源流向环太湖地区的重要通道。

四、余论

中原与东南地区的交流往来渊源颇深。新石器时代,粟的南传线路之一便是经由长江中游地区到达东南沿海地带,进而向更南的台湾及东南亚岛屿扩散^[49];二里头时期,有学者曾对二里头文化的南传做过详尽的分析,认为存在一条从南阳盆地经过随枣走廊进入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继而顺江东向至九江再传入赣江流域和鄱阳湖地区的路线^[50]。夏商时期,象鼻盃、原始瓷大口尊的分布情况表明长江中游地区在中原与东南地区的联系中起到了越来越明显的作用^[51],武汉盘龙城即此阶段最为重要的中转点。屯溪邻近闽、浙、赣三省,此地曾调查发现一件陶甗^[52],敞口有流,年代约为早商时期,似乎暗示休屯盆地可能存在尚未被发现的早期遗存,但至迟自西周早期偏晚阶段,该区域作为中原与东南地区交通往来的一个重要节点,以捐客的角色迅速发展,形成了一个区域文明中心。

西周时期,长江中游在中原与东南地区的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应、曾的分封体现了西周王朝对南土的悉心经略,不论在

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中我们均可以看到两国在昭王南征、讨伐淮夷、南淮夷等军事活动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本文以屯溪土墩墓群为中心,勾勒了西周时期中原与东南地区交流互动的路径,并认为长江中游在此网络中地位突出。

参考文献:

[1]以马承源先生为代表,详参马承源:《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铜器的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四期)》,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2]以李国梁先生为代表,详参李国梁:《从青铜兵器看屯溪土墩墓的时代》,《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第 124—131 页。

[3]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第 25—26 页。

[4]李学勤:《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1988 年第 5 期。

[5]陈小三:《平顶山应国墓地新见铜盃与吴越地区西周铜器断代》,《考古》2015 年第 5 期。

[6]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第 232—234 页。

[7]郎剑锋:《吴越地区出土商周青铜器研究》,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2 年。

[8]杨楠:《江南土墩遗存研究》,民族出版社 1998 年,第 50—79 页。

[9]付琳:《江南地区两周时期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4 年。

[1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 M28 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3 年第 4 期。

[11]a.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柴岭山土墩墓》,文物出版社 2013 年,第 313—317 页;b. 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第 65—67 页;c. 王冬冬:《铜陵师姑墩遗址出土器物的初步分析——兼论皖江流域中段三代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问题》,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3 年。

[1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陵千峰山土墩墓》,《考古》1989 年第 3 期。

[1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陵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南陵龙头山西周土墩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13 年第 10 期。

[14]杨鸿霞:《安徽省繁昌县平铺土墩墓》,《考古》1990 年第 2 期。

[1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宁国市安友西周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 14 辑),黄山书社 2005 年。

[16]宣城市博物馆:《宣州棋盘崔村土墩墓出土器物》,《文物研究》(第 14 辑),黄山书社 2005 年。

[17]a.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 5 期;b.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徒烟墩山西周墓及附葬坑出土的小器物补充材料》,《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1 期。

-
- [18]南京博物院、丹徒县文管会：《江苏丹徒磨盘墩周墓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1期。
- [19]镇江博物馆、丹徒文管会：《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铜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5期。
- [20]镇江市博物馆、溧水县文化馆：《江苏溧水乌山西周二号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2》，文物出版社1978年。
- [21]刘建国、吴大林：《江苏溧水宽广墩墓出土器物》，《文物》1985年第12期。
- [22]a. 王志敏、韩益之：《介绍江苏仪征过去发现的几件西周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b. 张敏：《破山口青铜器三题》，《东南文化》2006年第2期。
- [23]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浦口出土一批青铜器》，《文物》1980年第8期。
- [24]刘兴：《镇江地区近年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年。
- [25]江西省上饶县博物馆：《上饶县马鞍山西周墓》，《东南文化》1989年第4、5期。
- [26]福建省博物院、闽越王城博物馆：《福建浦城县管九村土墩墓群》，《考古》2007年第7期。
- [27]陈元甫：《越国贵族墓葬制葬俗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10年第1期。
- [28]同[1]。
- [29]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长子的殷周文化遗存》，《文物》1959年第2期。
- [30]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图36。
- [31]a. 石谷风：《青阳出土的西周晚期铜器》，《安徽文博》1983年第3辑；b. 张爱冰：《安徽青阳汪村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东南文化》2011年第4期。
- [32]a.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b.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东周5》，文物出版社1998年。
- [3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 [3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 [35]同[3]，第81—82页。
- [36]赵玉泉：《武进县淹城遗址出土春秋文物》，《东南文化》1989年第4、5期。
- [37]同[34]。

-
- [38]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繁昌县文化馆：《安徽繁昌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2期。
- [39]施劲松：《论我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大口尊》，《文物》1998年第10期。
- [40]林永昌：《西周时期晋国墓葬所见性别差异初探》，《古代文明》（第7卷），文物出版社2008年。
- [41]张昌平：《论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曾国青铜器的生产背景》，《文物》2013年第7期。
- [42]孙战伟：《西周陶大口尊类型及其分布特征》，《文博》2010年第6期。
- [43]a.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上）、（下），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23页；b.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省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年第7期。
- [44]同[43]b。
- [45]同[5]。
- [46]陈小三：《长江中下游周代前期青铜器对中原地区的影响》，《考古》2017年第2期。
- [47]朱心持：《江西余干黄金埠出土铜甗》，《考古》1960年第2期。
- [48]朱嵩：《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研究》，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0年。
- [49]陈洪波、韩恩瑞：《试论粟向华南、西南及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农业考古》2013年第1期。
- [50]向桃初：《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考古》2011年第10期。
- [51]罗汝鹏：《从“象鼻盃”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论夏商时期东南地区对中原王朝的一种贡赋模式》，《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 [5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山区出土一件商代陶甗》，《文物研究》（第5辑），黄山书社1989年。